

论晚清早期改良派的思想特征

侯 杰

晚清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大都和洋务活动有联系,后又超越了洋务派。他们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某些思想政治学说,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反映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为摆脱民族危机,大胆提出改革封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思想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呼风唤雨。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晚清早期改良派大都来自封建士大夫阶层,有的还曾经跻身于官僚行列,都受过较深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们的思想中,保存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这种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共同充当他们认识近代世界、改造近代中国的思想武器,呈现出中西杂糅的典型特征。因此,当我们对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汤震、宋育仁、宋恕、邵作舟等晚清早期改良派的思想进行考察研究时,既要分析他们思想中对近代中国社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学说,也要考察与其发生某种关系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

晚清早期改良派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群体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及他们在挽救危机中所应担负的神圣使命。他们懂得要应付这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就要谨记“通天地人之谓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的古训,博古通今,向西方学习,向包括天学、地学、人学以及算法、测量、政教、制造诸艺在内的外来文化学习。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

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从而在思想上超越了洋务派。

主张经世致用的晚清早期改良派继承了中国学以致用学风,致力于“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举以问世”(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自记》)的艰难探索,并且渐渐“通达时务,熟稔外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被许为“于学无所不通,而其意则在务为当世有用之学”(俞樾《显志堂集·序》)。他们广泛地学习西方,但常常是刚刚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学说,尚未得到很好的消化吸收,便匆匆拿来应付社会实际政治需要。晚清早期改良派还往往改造并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帮助人们理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以便于传播西方文化。他们以中学附会西学的种种理论阐释,充分地表现出杂糅中西的思想特征。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乏“变易”的思想,而这种变易讲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古人因时变通的说法却成为晚清早期改良派学习西方、改革社会、挽救危机的重要理论根据。郑观应认为:“《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盛世危言·自序》）王韬也讲“《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薛福成则透过传统的思想，悟出“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的道理，更坚定了立意图治、变法求新的政治信念。

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变动的事实，也被晚清早期改良派作为“变”的思想根据。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从未发展变化的观点，王韬驳斥道：“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薛福成也谈到在上古时代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随着历史发展，才使“鸿荒之天下，一变而为文明之天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到晚清，西方列强入侵又使“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筹洋刍议·变法》）。邵作舟对晚清社会变动更有清晰明白的阐释，“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邵氏危言·纲纪》）由此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特别是面对西方列强“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未，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的严酷现实，晚清早期改良派们不得不发出“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的呐喊。他们认为即使古代圣贤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是要力主变革的，因为孔子本人就曾对“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他们确信“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王韬《易言·跋》）。

当封建顽固势力死守华夷之辨等腐朽观念时，晚清早期改良派打出“礼失而求诸野”的旗帜。郑观应明确地指出：“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盛世危言·学校上》）同时，他们还给墨守陈规，以华夷之辨为理由反对学习西方、维新变法者流以猛烈抨击。王韬痛斥这些人“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弢园文录外编·睦邻》）。薛福成则认为学习西方不但不是以

夷变夏，而且正是为了用夏变夷，“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筹洋刍议·变法》）。在他看来，必须向西洋诸国学习，驾乎其上，在国际竞争中才能自立，才能保住进而发扬自己的文化，以同化西洋诸国。相反，“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具体说来就是“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筹洋刍议·变法》）。

在强烈的中西对比中，晚清早期改良派看到中国的差距，找到了由变革而富强的途径，“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王韬《弢园尺牍》第93页），“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而我则可“与泰西争衡，而收其利权”（陈虬《治平通议·经世博议》）。为摆脱民族危机，改变屈辱命运，他们在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改良的理论依据，提出变法主张。他们的变法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

二

在晚清早期改良派的变法思想中，有许多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思想火花，而在形成、阐发变法思想的过程中，传统思想观念又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他们的某些思想主张，还是沿着中国传统思想轨道运行的。比如，重视民意的主张，在《尚书·盘庚》提出“重我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后，历代政治家、哲人不断强调民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晚清早期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新变法，旨在谋求各种非常实际的富国利民的方略，仍以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王韬即认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上》）。他们深知民族的命运和平民百姓是息息相关的：“从来国运之盛衰，系乎民心之离合”（郑观应《易言·论吏治》）。在大变动的年代，民心得失更是关乎励精图治、富国去辱的大事。

晚清早期改良派认为要想得民心，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设立议院，使君民一体，上下同心。马建忠留学欧洲时，考察了西方

政俗民情后说：“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适可斋记言·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尽管他后来更多地看到这种制度的弊端，而不主张仿行此制。王韬是较早地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政治的人，他以为在西方的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这三种政治制度中，君民共主最理想。因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愈吁咻，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郑观应则更积极地提倡西方议会政体，在他看来“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有了议院，“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才有可能“张国威，御外侮”。郑观应提出的设议院的依据，仍不外乎传统的君舟民水论：“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盛世危言·议院上》）

陈炽则以英、德为例，阐明设立议院就可以“举无过言，行无废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心一德，合众志以成城”的道理，而他的上述议论也是与其“夫民心即天心也，下协民情，即上符天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导之而使言，进之而使通，联之而使合”的认识分不开的。显然，和晚清早期改良派其他代表人物一样，陈炽的头脑中也存留着传统思想观念，并以其附会西学，如说“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谏建谏，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庸书·议院》）。

思想比较激进的宋恕主张“欲通君、官、民之气必自开议院始”，他不仅将开议院视为国家富强的三大纲领之一，并且指出，白种之国，独俄罗斯无议院，故俄最不治。黄种之国，独日本有议院，故日本为最治。宋恕还主张效法欧美，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解救平民百姓，“斟酌古今采欧美，更改制度活黎元”（《六斋卑议·议报章》），使中国走上维新之路。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认为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也作出“西洋

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的判断。在比较保守的汤震看来，西方的议院“集众人之议以为议，即王制众共众弃之意”，如变通而后实行，则“忌讳之科白，不攻而自破，吏胥之舞弊，不杜而自祛，始可言振作，始可望挽回。我国家转弱为强之机，其权舆于是欤！”（《危言·议院》）何启、胡礼垣史从孟子“得乎邱民，而为天子”入手，指出“必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若是者国有万年之民，则君保万年之位”，以进一步印证“民主即君主，君主亦民主”的见解。

总之，晚清早期改良派倾向于借助西方议会政治的引进，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社会政治格局。除宋恕等人外，他们所追求的多是君民共主政治，期望朝廷与民同忧乐，开诚布公，共政事。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晚清早期改良派最推崇管子的这句话，认为抛开利民、富民而谈政治就是一文不值的空话。为使人们仓廩实，衣食足，安其居，乐其业，求得“宜古亦宜今，宜西亦宜中”的富国利民的良策，他们从“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农本思想出发，认为“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郑观应《盛世危言·垦荒》），重视发展农业。在整顿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除仿行井田、沟洫外，还讲求农学，行西方风车之法等。陈炽则主张在学习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同时，注重利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中西贯通，发展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晚清早期改良派确信“民富而国自强”，主张建立、发展新式工商业，以自握利权。他们利用传统的“藏富于民”的说法来宣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谋求富强的手段，广贸易，筑铁路，造轮船，开煤矿，通海运，兴电报，办公司，建银行，设保险，按照西法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用机器来“殖财养民”。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富强，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把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与西方竞争，谋求民族富强，抵制经济侵略的重要出路。基于“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的思考，他们提出“商战”口号，要兵战商战并举，以商战为主，固国本，强调了发展工商业以及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晚清早期改良派认为腐败、衰落的社会现实，完全是后人违反先贤圣人教导而造成的。为了实现他们理想中的三代政治，必须正本清源，这就是对

“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的科举制加以改革。最早提出八股无用的冯桂芬设想以新科目取士；王韬在要求改变科目的同时，主张完全由乡举里选，以“讲有用之学”；郑观应则认为文试要废时文，武试要废弓矢，但又呼吁恢复上古时期的学校。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新式人才，他们大力提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这对于打破靠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僵死局面，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尚行不尚才的取士方法和略似举孝廉方正的荐举等方法来选拔匡世救民的人才，显然与时代的发展极不协调。

晚清早期改良派提出的引进先进的西方文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商业，以及富国利民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吸引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然而他们的基本理论及命题又大都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各种联系，因此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致使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难达到新的高度。

三

晚清早期改良派是“中国固有论”的提倡者和鼓吹者。王韬认为：“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弢园文录外编·原学》）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学习的西方政治及知识技艺等，被汤震视为“明明中国旧有之绝技”，“大抵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西人艺术，泰半本之诸子。试取《筮墨》关列淮南等书，以类求之，根源具在。然则谓我中国今不如古则有之，而妄谓中不如西也可乎？”（《危言·中学》）郑观应也说：西学不过是将“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盛世危言·西学》）。他们把西方事物当成中国固有的，意在使国人不要将其作为舶来品加以排斥。他们还把主张复古反对西学的人们斥之为不智，这样做既维护了西学源自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又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西学。但中国固有论思想会使人们沉溺于对过去的玩味和回忆，妄自尊大，这就妨碍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正常进程。

本来中国上古的三代政治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

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晚清早期改良派却将它们两相附会，从不同角度加以类比。郑观应说：“考泰西开国至今，历年未久，故其人情风俗，尚近敦庞，犹有上古气象。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易言·论议政》）薛福成则感触很深地说：“《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出使四国日记》卷5）何启、胡礼垣甚至认为：“尧舜之世即今泰西民主之国，汤武之世即今泰西君主之国，太甲成王之世即今泰西君民共主之国也。”他们还提出“今外国之所谓公理公法，其精意在中国二千四百年前已详辨明”。而关乎国家能否自立的民权，在中国也是“于古最明”（《新政真论·前总序》）。

此外，晚清早期改良派还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与西方的社会现象相附会。譬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日报，与中国的《春秋》一样；西方的宗教实际上也是源出中国，“摩西者，墨子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世也”，“盖墨氏见距于圣门，转徙迁流而入西域，其抱器长往者遂挟中国之典章文物以俱行也”（陈炽《庸书·教民》）。这种附会暴露出提倡学习西方的晚清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政治生活与社会缺乏真正的客观了解。他们赞成引进西方议院制，主张以此来改革中国政治，但又不想妨碍封建皇帝的君权及旧有礼法，于是选择了君民共主，从而使三权分立和君主无责任的西方议会失去原有的光彩。他们从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寄希望于“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郑观应《易言·论议政》），力图使人们看到学习西方，改良现存社会政治，不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笔抹杀，而是要恢复理想中的三代政治。他们还把学习西方作为中国统一世界的希望，列强所依恃的一切都可为中国效法，为将来一统天下作准备。晚清早期改良派仍循着传统的思维逻辑将中国传统思想称为道，奉为本，而把西方科技视为器，称作末，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他们将天主教、耶稣教与儒家思想作比较，认为“惟中国孔圣人之教，至大至

公”，外国宗教则因排斥异端，上逆天心，下残人命，“终将歇绝衰微”。并断言“窃意五百年后，圣教将遍行于地球”（陈炽《庸书·圣道》），“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陈炽《盛世危言》序）。到那时天将以器还中国，而以道行泰西，“则我黄帝之子孙，孔门之子弟，将方行于四海，充塞于两间，成古今大一统之闳规，创亿万斯年同文、同轨、同伦之盛业也”（陈炽《庸书·圣道》）。

中国历史上不乏乌托邦的理想，古代思想家的大同世界建构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而晚清早期改良派的大同世界理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又具有新的时代风貌。面对惨痛的社会现实，他们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明，将学习西方技艺看作是通向大同世界的途径；同时，又借助中国传统的“道”来达到一统天下的境界。

综上所述，在晚清早期改良派思想中，既有代表时代发展方向、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又夹杂着

大量的传统观念，呈现出中西杂糅的典型特征。传统思想观念对于他们变法维新，昭示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传统观念和主张又阻碍了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的步伐。

显然，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交融，也鲜明地反映在晚清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中。他们痛恨顽固守旧者“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但又排拒个别人士“不深察中国之人情，与国家创制显庸之本意，又张皇震骇，欲一切舍而从之”的崇洋倾向。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他们恪守着“法之宜守者慎守之”，“法之当变者力变之”（陈炽《庸书·名实》）的态度。

（本文作者：侯杰 南开大学历史系
讲师）

责任编辑：王琳

（上接第96页）解诗，这是《纂解》的又一方法。如《邶风·桑中》，编者认为这是一首“朴素自然，清丽流畅的民间情诗”，但古人和今人对此均有不同之见。编者便从诗体的惯用形式及惯用手法的角度反驳他说，以证己说之确。

从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以确定诗旨，也是《纂解》的一种方法。如《郑风·缁衣》，旧解此诗有“美贤”、“好贤”之说，编者则认为是“赞美郑人热情接待外国客使的诗。表现了郑人周到好客，注重邦交”。其论证诗旨时，便分析了当时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反，对于无视历史条件，以现实加以比附的“诗旨”，编者则给以实事求是的批驳。如胡适因“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便认为《召南·小星》一篇“是妓女星夜求欢的诗”，编者认为这是“无视社会制度发展的无稽之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索诗旨，并不是“以史代诗”或“以史附会”，对于那种不顾诗篇本身内容，把诗硬坐实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诗解，按语中亦多有批评。

在解释诗旨的同时，编者还注意到某些诗篇在诗歌史中的开风气意义。如指出《邶风·绿衣》“开后世悼亡之体”；《邶风·简兮》“可视为直接描述我国舞蹈艺术的最早诗章”；《卫风·氓》“是

我国最早的一首结构完整，人物鲜明的叙事抒情诗”。《唐风·葛生》的意境，“以思念征夫而言，犹如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是也；以悼亡言，犹如宋词‘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是也”。这是一种注意历史联系的方法。

《纂解》在解诗过程中所表现的方法，不止于上述，比如还有以“民俗背景为依据”分析诗歌内容的方法。本文限于篇幅，略述大体而已。正是由于编者运用多种方法解诗，因而才多有创获。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在解诗当中，还经常把解诗之法作为一种原则提出。如“说诗要考全篇之义，不可拘泥于一字一词，以致误解全诗。”“倘诗义与史实不能切合，断不可以史代诗也。”“本来原诗模糊含蓄，为什么偏偏要用一种定论做结呢？还是给读者一点欣赏的空间余地为好。”“过于求深、求实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等等，这些原则的提出，使得《纂解》一书脱离了就诗论诗的层次，而带上一定的理性色彩。

总之，《纂解》的确是解《国风》诗的一部佳构。当然，它并非无可指摘，有些新解尚可商榷，不过毕竟瑕不掩瑜。笔者企盼编者再搞出关于《雅》、《颂》的纂解来，与本书合成新解《诗经》的完璧。